

本期专题：“最难就业年”

- 02 “最难就业年”如何破解
- 03 透视大学毕业生“最难就业年”
- 05 岗位少 观望多：大学生遭遇“最难就业年”
- 06 上海市教委：应届生就业率非“史上最差”
签约率44.4%
- 08 大学生“最难就业年”来袭
- 12 专家称舆论看待大学生就业存在误区
- 13 2013大学毕业生质量排行榜出炉
教师水平成主因

国是论衡

- 15 金融改革的启动路径

政坛经纬

- 18 你怎样定义“成功”

历史深处

- 20 1978年真理标准讨论中 习仲勋先行表态

悦读时光

- 封三 《蒋介石的阅读史》(四)

编者按：699万，这是即将从全国各地普通高校涌向社会的应届毕业生人数，这一数字比去年多了19万。目前各地应届毕业生就业签约率普遍明显下滑，今年便被冠上了“最难就业年”之名。

一般来说，受性别、年龄、学历、专业、户籍、院校等限制因素困扰，女生、非重点高校、基础学科三大群体的就业问题更为突出。”

面对今年新的就业形势、就业环境、就业群体，调整和完善就业政策，出台新的就业措施，建立长效机制，刻不容缓。

多位高校就业中心负责人均认为，今后几年，关于“大学生就业难”的话题将一直存在，因为，就业观念的问题一时难以解决，大学生就业结构性的矛盾就无法避免。

北京市人社局副局长张祖德认为，近期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就业岗位需求减少，传统就业岗位趋于饱和，使得岗位需求数量下降。另一方面，部分毕业生对就业和事业的结合度以及对岗位的要求都提高了，这也相应增加了就业压力。

“最难就业年”如何破解？《人民日报》一语中的：终结各种有违公平公正公开的暗箱操作和“拼爹游戏”，营造公平公正的竞争氛围和社会环境，才能化解大学生的就业焦虑。

大学生就业难将累及无数个家庭。本刊特此推出“最难就业年”专题，供您参考，其他栏目的文章新盼引起您的关注。

主 办：盐城市图书馆

刊头书法：臧 科

主 编：刘 进

责 编：周玉奇

地 址：盐城市城南新区府西路6号

邮 编：224005

电 话：0515-69971581 18961988622

邮 箱：75156450@qq.com

网 址：www.yctsg.cn

设计制作：盐城市圆融数字印刷有限公司



“最难就业年”如何破解

一边,是创下历史新高的毕业生规模——来自教育部新近公布的数字称:2013年全国高校毕业生达699万人,比2012年增加19万,刷新纪录。一边,是计划招聘岗位数的下降——据2月初对近500家用人单位的统计,今年计划招聘岗位数同比平均降幅约为15%……严峻的就业形势像雾霾一样,成为人们无奈却无法回避的话题,以至于有人称今年可能是“最难就业年”。

这种局面缘于多种因素的叠加。经济增速的放缓,产业结构的调整,导致部分行业就业需求下降。加上毕业生总量增加,高校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间的结构性矛盾问题长期存在,造成了今年就业压力增大。

而这种情形有可能在较长一段时期内存在。我国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之后,大学毕业生的数量一直持续增长,目前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30%,根据国家发展规划,到2020年将提高到40%。因此,破解大学生就业难题,将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民生工程。

事实上,近年来,高校毕业生的就业问题,已经被提到越来越高的位置。十八大把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提到了所有就业群体的首位,明确要求“做好以高校毕业生为重点的青年就业工作”、“支持青年创业”、努力实现“就业更加充分”、“推动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这一方面说明就业形势具有长期性、严峻性,另一方面也表明,解决好青年就业问题,不仅是民生保障和改善的重点,更

关乎社会的长远发展。回顾近几年的大学生就业形势,客观说,2009年的“压力山大”要远胜今日。当年,全国高校毕业生首次突破600万人大关,比2008年增加52万人,是现在增加人数的两倍多。那一年,国务院出台加强高校毕业生就业的7项措施,政策给力,群策群力,缓解了当年就业紧张局势,也使近年来高校毕业生就业率基本稳定在86%以上。和4年前相比,今天的就业形势固然严峻,但无论是重视程度还是应对措施,我们更得力也更富经验,有理由再闯难关,缓解压力。

面对今年新的就业形势、就业环境、就业群体,调整和完善就业政策,出台新的就业措施,建立长效机制,刻不容缓。

高校的改革必须提速。资料显示,目前大约1/3的毕业生在从事与其所学专业无关的工作,部分专业毕业生就业的专业对口率不到30%。“市场需要的是蛋糕,学校送出的却是包子。”革除这种教育弊端,为鼓励大学生创业营造良好的教育环境,才能为大学生就业开辟一片新天地。更需看到,就业压力之下,“公平”二字尤其重要。只有摒弃学校、性别、户籍、年龄等就业歧视,终结各种有违公平公正公开的暗箱操作和“拼爹游戏”,营造公平公正的竞争氛围和社会环境,才能缓解大学生就业之困,化解他们的就业焦虑,让他们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

(5-10《人民日报》袁新文)

透视大学毕业生 “最难就业年”

一般来说,受性别、年龄、学历、专业、户籍、院校等限制因素困扰,女生、非重点高校、基础学科三大群体的就业问题更为突出。我国大学生就业难的主要原因在于国家、高校、大学生个人等层面的人力资源开发没有主动与我国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的客观要求相适应。应积极完善就业立法以及相应的诉讼制度和劳动监察,从司法角度加强对大学生平等就业权的保障。

进入5月,毕业生求职高峰时段已过大半,多地高校毕业生还在为“饭碗”苦苦寻觅。

根据近日召开的北京市高校毕业生就业推进会公布的数据,截至今年4月,北京地区高校毕业生签约率为28.24%,其中研究生签约率36.59%,本科生签约率26.6%。上海、广东等省市的高校毕业生签约率也不足三成。

经济增长趋缓,多达699万名毕业生的规模使得结构性矛盾依旧十分突出,重重压力之下,各方对毕业生就业难背后所存在的体制、制度、观念上的深层原因再次给予高度关注。

女生、非重点高校、基础学科三大群体就业问题突出

“在高校毕业生的就业问题上,不同群体的就业难度不尽一致。一般来说,受性别、年龄、学历、专业、户籍、院校等限制因素困扰,女生、非重点高校、基础学科三大群体的就业问题更为突出。”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行政管理学系主

任、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肖鸣政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表示。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一位应届毕业生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因为专业等原因,我只能被动地被选而不是主动地去择业。”由于供需不对等,文科生择业方向普遍扎堆。“另外,对我不利的因素还包括就业中的隐形歧视,比如性别、地域、年龄歧视。”

当前正就职于北京一家私人工作室的应届毕业生侯涛告诉中国经济时报记者,他的本科就读于一所不错的211院校,硕士选择去英国留学。尽管自身条件不错,但回国后的求职经历还是颇费周折。“要是你的专业不对口,根本没有面试机会,比如我的专业是电视编导,如果投广告、公关之类的,就很少有让我去面试的。”侯涛告诉本报记者,专业限制给他的就业选择带来了不少困难。

“在我们看来,大城市机会也许更公平些,如果不是大城市,多数情况下会出现‘人情关系超过学历’的现象。个人关系成了就业‘敲门砖’。”天津外国语大学的一位日语专业应届毕业生对本报记者说,有时候并不是没有参与择业的机会,而是在最后录取的时候,往往都会出现机会不均等的情况。

近年来,IT类、经济、管理、金融等专业相当火爆,历史、哲学、数学等传统基础学科却乏

人问津。

“社会公平首先应是机会公平，对于高校毕业生来说，平等机会给予他们的不只是一次面试机会，更重要的是给他们继续接受竞争的信心和勇气。”肖鸣政认为，目前，我国高校学科设置与市场脱节，无法与用人单位的实际需求相适应。由于课程开设成本较低，许多文科、社科类专业过度膨胀，而有着较大市场需求的工科则由于实验成本、设备成本高而开设较少，这就直接导致了文科毕业生的供大于求。

据记者了解，近日，教育部办公厅发出《关于加强高校毕业生就业信息服务工作的通知》，规定凡是教育行政部门和高校举办的高校毕业生就业招聘活动，严禁发布含有限定 985 高校、211 高校等字样的招聘信息，严禁发布违反国家规定的有关性别、户籍、学历等歧视性条款的需求信息，“院校门槛”等问题开始得到教育部的正式回应。

职业生涯的规划、引导是大学教育应有的题中之义

侯涛告诉本报记者，“在英国，他们在大学期间会拥有更多时间和机会去行业内实践。而且，大学课程的设置本身就也和业内工作接轨，能真正实现学以致用。现在，很多企业对培养零起点的职场新鲜人，依然缺乏勇气和耐心，‘经验’两

字是对刚走出校门的社会人最高的门槛，也常常让我们感到无能为力。”

肖鸣政也指出，在教学方式上，高等教育重理论、轻实践，缺乏素质教育 and 能力培养。许多学校划分专业过细，培养出来的一些毕业生知识面窄，学习能力和适应能力较差。

他认为，大学教育有别于职业教育，并不该仅关注一个学生的就业，而更应该通过课程设置、教学方法、考核手段等影响学生的人格培养和素质养成。此外，融入职业生涯的规划、引导也必须是大学教育应有的题中之义。

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应届毕业生们还认为，回顾求职历程，没有一个系统、长远的职业规划也是导致后期求职坎坷的重要原因之一。“很多学生在临近毕业或者已经毕业后，对自己的职场规划依然不清晰。想做什么，能做什么，自己都不清楚。糊里糊涂地求职，必然也导致择业现状的不尽人意。”

而对于衡量一份好工作的标准究竟是什么？多数应届毕业生给出的答案是，并不完全局限于薪酬和激励制度。而有效率的工作环境、有发展的工作前景、有意义的工作内容则更被关注。对于刚刚走出校门的应届毕业生来说，从事的工作内容和过程能够带来精神满足感显得非常重要。

“虽然我国大学生就业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原因还是在于国家、高校、大学生个人等各层面的人力资源开发没有主动与我国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的客观要求相适应。”肖鸣政建议，加快市场体系的建设和完善，发挥市场公平、平等竞争的优势，纠正因我国市场不完全、不灵活和非道德性造成的市场失灵。同时，积极完善就业立法以及相应的诉讼制度和劳动监察，从司法角度加强对大学生平等就业权的保障。

（5月13日中国经济时报 胡亮）



岗位少

大学生遭遇

『最难就业年』



辛辛苦苦跑了大半年，海投的简历记不清有多少，眼看今年上半年的就业高峰就要过去，手上却依然没有录用通知的消息。一边是就业岗位少，一边是观望者多，面对一降再降的就业率，大学生就业究竟路在何方？

找了大半年未签约“最难就业年”来了吗？

高飞龙是山西省晋中市晋中学院计算机专业的学生，为了找工作他曾多次往返于太原与晋中之间。“找工作跑了大半年，花费了不少钱，到现在也没有签下一个，找个合适的工作真是难。”高飞龙说，班里的大部分同学都还没有拿到用人单位的录用通知，经历了多次打击，大家找工作的标准降得不能再低了。

“原来想着工资要 3000 元以上，地点不要离家

太远，还得有较好的发展空间。”高飞龙说，“现在觉得工资能达到 2500 就不错了，地点无所谓，工作前景别令人看不到希望就行。”

太原理工大学大四学生杜佳佳年前只拿到一个贵州某煤矿企业的录用通知。他是山西忻州人，父母不太同意他工作离家太远。他说：“能找一个专业对口的工作已经很不容易，再想离家近点实在不好找。”

杜佳佳学的是机械专业，是太原理工大学较好的专业，就业状况一直比较好。“目前学校的直属本科就业率为 32.34%，去年同期是 48%，落差较大。原来文科就业相对较弱，机械、矿业、水利等优势专业就业不存在问题，今年也遇到了点困难。”太原理工大学招生与就业处处长袁俊芳说。

据知名社会调查机构麦可思研究院的跟踪调查，2013 届毕业生求职难度增加。该机构从 2012 年 12 月 12 日开始到 2013 年 1 月 11 日结束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本科毕业生签约率为 38%，低于上届同期 8 个百分点。因此，2013 年在网络上被戏称为“史上最难就业年”。

（4 月 8 日 新华网 刘怀丕 王菲菲）



上海市教委：应届生就业率非“史上最差” 签约率 44.4%

今年毕业季被称为“史上最难就业季”。今天上午，市教委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当前大学生就业情况和应对举措。本报记者从本市多所高校和人才市场获悉，一方面用人市场确实不景气，另一方面部分高校在专业设置方面，和市场需求不够接轨；学生和家長在就业观念方面上存在一些亟需转变的误区，如不少学生看不上中小型企业；一些家長也纵容孩子“主动不就业”，认为还“养得起”。

数据

目前签约率 44.4%，近五年内暂排第二

本科生签约率降，专科生上升

今天上午，市教委举办高校毕业生就业情况媒体介绍会。市教委李瑞阳副主任介绍了 2013 年高校毕业生就业基本情况，以及市教委和相关委办局在促进毕业生就业方面切实采取的措施。

市教委副主任李瑞阳介绍，目前对上海大学生就业存在两个极端判断，一是上海前几年就业形势也很严峻，但每年最后的就业率都在 95% 以上，今年估计也不例外。还有一种判断认为，今年就业是

近几年最严峻的一次，“从目前上海大学生就业情况来看，比去年同期要差，但是比 2009 年—2011 年同期要好。今年最终的就业情况还要看五、六月份，从目前来看，今年就业情况并不像媒体说的极端严峻，但是也不能掉以轻心。”

那么现在上海大学生就业情况如何呢？李瑞阳表示，2013 年上海高校毕业生总量为 17.8 万，与 2012 年基本持平；其中研究生 3.9 万，本科生 8.9 万，专科（高职）生 5 万。截至 5 月 10 日，本市应届毕业生总体签约率为 44.4%，同比去年下降 2 个百分点，但比 2009 年—2011 年同期要高。根据市教委 4 月 10 日、4 月 25 日的就业统计情况来看，签约率分别比去年同期下降 4.07 和 3.17 个百分点，而 5 月 10 日签约率比 2012 年同期下降 2 个百分点。这表明，上海毕业生签约率下降的幅度有收窄的趋势。“这可能与 4 月到 6 月是签约高峰有关。”李瑞阳说。

研究生、本科生签约率比 2012 年同期分别小幅下降 2.2% 和 4%，但专科（高职）生签约率小幅

上升1.2%。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当前985、211高校就业情况要好一些，市属高校相对差一些。“这可能和市属高校培养人才存在定位尴尬有关。它不像985、211高校明确培养研究性人才，专科院校培养应用实践性人才。市属高校办学定位在人才培养上确实存在不上不下的问题。”

经济增长放缓是就业难主因

李瑞阳分析，目前大学生就业主要受三方面因素影响。首先是受经济增长放缓和经济结构调整影响，使用人单位需求总量下降。数据显示，2013年，到各高校开展招聘单位和提供的岗位数有所下降。目前，社会服务业、制造业的用人单位用人需求降幅明显，三资和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型民营企业的招聘吸纳人力的情况不如往年，也出现减招和停招的情况。

其次，从企业招聘的需求总量来看，是可以满足在沪毕业生的就业需求，但是细分到毕业生的单位、学历、能力等具体要求，存在岗位需求和毕业生匹配度不高的问题。同时，由于企业需求量下降，还导致985、211高校毕业生挤压市属高校毕业生岗位、社会上有工作经验人员挤压没有工作经验大学毕业生岗位、研究生挤压本科生岗位等情况。

第三，大学生自身的因素也影响到签约率。90后大学生自主意识强，对就业的认识多元化，也出现就业意识不足的情况。部分毕业生对就业岗位挑挑拣拣，预期调整不及时，导致最后错过了合适的岗位。此外，随着非上海生源人数增多，就业困难人员也有所增加。

希望留沪就业者半数已签约

市教委学生处处长汪歙萍介绍，据相关了解，今年针对应届生的岗位需求总量为15.2万。而今年17.8万毕业生中，有一部分学生存在不想就业和灵活就业情况，真正需要就业的人数在13万人。其中有上海生源和非上海生源。这其中，希望留在上海就业的学生有10万人，目前已经有5万学生签订了就业协议，还有5万人尚未签订就业协议。

为什么还有部分学生没有签约？汪歙萍认为，一是企业期望与学生期望不匹配，主要表现在薪资上。调查显示，在上海高校读书的学生对薪资相对期望高，在外地高校读书的学生对薪资的期望相对低。二是，在产业转型过程中，企业提供的岗位目标需求和学生的适应性存在差异。三是，企业更希望招有工作经历的毕业生。

采取多举措促进大学生就业

针对大学生就业现状，近期市政府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相关市领导专门部署和协调相关工作，市教委和相关委办局采取切实措施，加以落实和推进。

近期落实和推进的四项工作包括：市教委今日举办高校毕业生就业情况媒体介绍会；市教委将于近期召开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推进会；5月21日至27日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教委、市总工会、市工商联共同举办“2013年全国民营企业招聘周”；本市多部门共同研究试点实施“大学生社区服务计划”等。

同时，市教委和相关委办局促进毕业生就业的部分举措。包括：市经济信息化委将举办第一届上海（国际）中小企业精品展，扶持中小企业发展，吸引毕业生到中小企业就业；市科委将进一步挖掘所属（辖）大型科研院所的岗位潜力。同时增加“创业苗圃”数量，引导和扶持大学生创业；市国资委发动委管企业进一步加大大学生招录工作力度；团市委组织“青春扬帆梦想启航”促进大学生就业创业活动；市教委近期举办张江高科技园区、临港新区暨漕河泾新兴技术开发区等多场网络专场招聘会；市教委将开通易班网就业信息板块，实现手机客户端就业信息定向推送功能。

市教委表示，将把毕业生就业工作与人才培养改革相结合，在多项教育评价中将就业情况作为考量指标，将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社会评价工作作为年度工作要点。

（2013-05-13 新闻晚报 张鹭；朱蒙蒙；李征；钱朱建）



大学生“最难就业年”来袭

“最难就业年”的到来除了因为庞大的毕业生队伍外，还与经济增长率的降低有关。撇开“宏观”因素，从小方面说，在厦门，其实毕业生自身以及企业本身的某些做法也都直接导致了“就业没有最难，只有更难”的局面。

大学生就业，究竟有多难？求职五个月仍在“等通知”

身着黑色套裙，手持个人简历，脚踩中跟皮鞋，寻寻觅觅，挤进人群，排队，面试，被告知回去等通知，再寻寻觅觅，再面试，再被拒，最后“凄凄惨惨戚戚”。

自去年11月起，这样屡次发生在朱妍身上的类似遭遇，一次次打击着这位原本对就业信心满满的本科外语专业应届毕业生。

前几天，朱妍刚参加过一场大型春季招聘会，结果依然是“在等通知”。而此前，她已经参加过大大小小的招聘会不下五场，至于递出过多少简历，连她自己也数不清了。和通过网申发出去的简历相比，招聘会现场所投的简历数量“估计只能用九牛一毛来形容了”。而绝大多数网申，最后都像“石沉大海”，没了音信。

5个月前，朱妍想留在厦门，想进银行、国企、跨国公司，但现在，她觉得这个美好的愿望“离现实好遥远”，慢慢地，她稍微放低了要求。“待遇方面不是最重要的，不过必须要有发展空间。宿舍里四个人只有1个靠着家里的关系找到了工作，其他

两个和我一样，都还没着落，再努力努力吧。”

据知名社会调查机构麦可思研究院的跟踪调查，截至今年1月份，本科毕业生签约率为38%，低于上届同期8个百分点。而据厦门多所高校负责就业指导的老师透露，截至目前，应届毕业生就业签约率与去年同期相比也都有所下降。供需失衡却还“挑肥拣瘦”。

“就业难，那是因为僧多粥少，供需失衡，竞争激烈。”这是许多应届毕业生的共鸣。求职时，他们身边总会挤满对手，因为他们看到的，总是招聘摊位前永远不知疲倦的涌动人潮。

厦大中文系的小诗说：“上次我应聘的一家国企就招两个人，排了1小时的队，等到我面试时，对方已经收到七八十份简历了，那会儿招聘会结束还有大半天时间呢。你说难不难？”

在今年厦门每所高校举行的招聘会上，国企招聘摊位前应聘者大排长龙，早已成了必须发生的盛况，可一旁小企业或民营企业的招聘摊位无人问津的冷清境遇，经常导致这样一幕幕与招聘会氛围格格不入的场景上演；弱势企业招聘负责人清闲得翻起了事先已备好的杂志。

对于这种现象，老师们并不意外，毕竟国企工资高、福利好、有面子、培训系统也完善。但从今年实际的就业大环境考虑，厦大学生工作处老师赵晓慧还是建议学生要认清形势，调整好心态，理性择业就业。

而根据厦门市人事部门的统计数据,今年厦门市生源当中非师范类毕业生总共有 20867 人,在用人需求方面总共有上千家用人单位上报了今年毕业生需求 28333 人。

从数据上看,毕业生似乎不用为就业发愁,但正由于大学生的就业期望、专业或学历与实际需求存在较大的结构性矛盾,所以就业变得“没有最难,只有更难”。企业走过场甚至用而不录。

如果说大学生对就业的期望值过高是出在“内部”的问题,那么,一些企业对大学生劳动力的恶意使用或者对招聘会的变相利用,那就是大学生无法自行处理的“外部”症结了。

所谓的恶意使用大学生劳动力,说白了,就是一些企业利用大学生求职心切,以“试用”之名招进劳动力,之后“用而不聘”。

据华厦大厦工一位自称遭遇过类似“试而不用”经历的王同学介绍,这样的企业常年都在招聘,而且每次招的人数也很多。“我就奇怪了,难道他们真的每年都需要那么多人?而且那么久了就一直都招不满?”王同学觉得,“试用期间,我白白付出了努力和心血不说,三个月里,我错过的机会才是最让人心疼的。”

一位老师证实,在厦门,金融行业里确实出现过这样的企业,因为他们需要大量劳动力去推销信用卡或其他业务等,此外就是一些不知名的小企业。除了“试而不用”,还有一小部分企业则是“不

试也不用”。

有学生反映,某些用人单位“对求职者表现得不感兴趣”、“面试时应付了事的态度很明显”、“招聘会还没结束就提前收摊走人,根本不像是来招人的”。

而据相关知情人透露,企业到招聘会“走过场”其实并不稀奇,原因有三:一是借招聘宣传企业,二是内定了人选后“走程序”,三就是为了企业和招聘会主办方的“双赢”。明确定位找到求职契合点。

谈及今年的就业形势,采访中,多位就业指导老师都不约而同提及“严峻”一词,总的来说,面对这一局面,高校希望毕业生能调整好心态,能对自己有一个明确的定位,并努力找到自身优势与企业需求之间的契合点。

而对于目前尚未找到工作的毕业生,老师们也有些许建议,比如到招聘会求职的效果要好过网申,因为现场求职可以和企业招聘人员进行简单的交流,容易给招聘人员留下相对深刻的印象。就算这一企业并不在你心仪的行列,但与企业 HR 多聊一聊,问问企业的核心技术是什么、企业规模如何、行业的发展前景等,通过这些指标,其实可以大致衡量出企业现状,也经常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在面试时,要紧扣岗位的素质要求。集美大学学生就业指导中心副主任张晖怀老师认为,因为企业招的是对该岗位最合适的人,所以应聘者应针对岗位的需求进行主要陈述,再辅助性地结合个人优点进行展现,其间,还要从面试官提出的问题中及时判断出其想得到的人力资源点。

此外,若学生要网申,适当提及自身在知名单位的实习经历,往往可以获得加分,同时,还要注意学会从招聘者的角度考虑,并根据岗位需要灵活变更信息重点。

(4月18日海峡导报 梁静/文 张向阳/图)



专家称舆论看待 大学生就业存在误区



“我已经拿到一个 offer (录用通知) 了, 可工资太低了, 我不准备签约, 再找找看看”、“你那份工作能帮着办户口吗? 不能, 就等等”……最近几个月, 在松江大学园区、奉贤大学城、南汇大学城的 BBS 及学生交流网络平台上, 常常可看到这样的对话。

而在网络、电视及报刊上, 社会公众看到的信息是: “今年成为新中国成立至今 64 年以来大学毕业生最多的一年”、“上海、广州等地大学生签约率不到三成”、“今年可能成为史上大学生最难就业年”等等。

多位高校就业中心负责人表示, 单凭几个数字就断言今年是大学生“史上最难就业年”, 存在一定的误区。

签约率不等于就业率

记者上周来到复旦大学、上海海洋大学、上海对外贸易学院、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采访高校的领导、就业中心教师及应届毕业生, 却得到另一番说法。“说今年大学生就业难, 是相比较而言。去年和前年, 上海高校学生就业形势特别好, 相形之下, 今年跨国公司、大型央企国企、外资企业的校

园招聘计划明显减少, 学生感到了就业压力, 但岗位还是有的, 能够满足学生的就业需求, 关键是学生和用人单位都要转变观念。”上海海洋大学副校长黄□建设道。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学生处处长徐阳则明确说: “由于用人单位结构变化, 学生签约率较上年下降约 8 个百分点。但现在学生手中握有 offer 的大有人在, 过段时间签约率预计会明显上升。”

“同高达 95% 的就业率一样, 签约率同样不能完全真实反映大学生就业市场的现状”, 上海外贸学院就业中心主任徐家仪告诉记者, 就业率包含了学生升学读研、出国、创业等情况; 然而, 截至目前统计的签约率, 排除了各类特殊的因素。

徐家仪介绍, 与前两年相比, 会计师事务所、银行、保险公司等用人单位到外贸学院招聘的明显少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些中小公司和民企。许多毕业生面对这样的企业, 更多地选择观望、等待, 迟迟不愿签约。

徐家仪说了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眼下, 人人都说就业难, 却很少有家长、学生为了工作, 主动来与就业中心联系的。徐家仪分析, 岗位不是没有,

就看学生是否能降低预期了。“四大会计师事务所、银行不招人了，学生愿意不愿意去中小企业呢？”徐家仪说，“这是下半年，学校就业率能否触底回升的关键了。”

企业给出月薪仅三千

黄口建则认为，部分企业来校园招聘，开出的薪酬实在太低了，学生即使拿到 offer，也不得不思考一番，这是当下签约率低的重要原因之一。他说，现在媒体上过分解读“大学生就业难”，导致企业招聘时不断挤压学生的利益空间，“3000元，这是用人单位给本科毕业生普遍的月薪，如果扣除缴金，大学毕业生的月收入甚至不如火锅店的服务员。毕业生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生活，生活费尚不足，买房遥不可及，何谈职业规划？”黄口建呼吁，企业招聘大学生，条件不必过于苛刻，“动不动就要学生会干部、学生党员，其实，除他们之外，高校还有大量的优秀学生。”他说，企业如果能为学生提供更好的生活及工作环境，高校毕业生签约率将稳步上升。

徐阳透露，目前，上海高校中外地大学生比例越来越高，而大企业用人指标减少，代替它们的是中小企业，没有办理上海户口的能力，外地学生因此很多选择观望，这是高校毕业生签约率降低的另一个原因。未来，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部分学生可能会选择“居住证”就业，签约率将自然回升。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签约率低除了学生迟疑、观望的因素外，还有企业的原因。不少企业都不愿意签订由单位、学校、毕业生三方认定的就业协议书，更愿意与学生单方面签订就业合同。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的毕业生小郭说，现在用人单位提供的大多都不是同学们心仪的岗位，很多学生“货比三家”，签约后再毁约是普遍的现象。而这份就业协议书，对企业是一种约束，只

要签了，就必须招聘大学生到岗；对学生则毫无约束力，学生毁约后，企业无可奈何。在这种背景下，企业招聘大学生往往采用先实习的方式，直到学生拿了毕业证书，没时间回旋余地时再签约。因此，这也导致了当前大学生签约率较低的事实，预计到了6月之后，签约率将明显上升。

高校扩招非根本原因

对于眼下的大学生就业难，多年来有一种观点将其归因于高校扩招。统计显示，本市高校毕业生总数确实呈连年增长态势。2009年为15.8万人，2010年为16.2万人，2011年为17.5万人，2012年为17.8万人，2013年也是17.8万人。2009年，全国大学生毕业人数首次突破600万，达611万人，2010年达630万人，2011年达660万人，2012年增至680万人，2013年达到699万人。有人称，“中国经济增长的用工需求，已无法跟上中国大学扩招速度”。

中国大学生真的太多了吗？对此，徐家仪表示，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大学生在人口中所占比例还有相当大的差距。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大学生不是太多，而是太少。“美国仅3亿多人口，就有3000至4000所大学；中国有13亿人口，包括职业院校在内，仅有2000多所大学。中国目前在校大学生3000余万人，绝对数惊人，但平均一下，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不足10%，低于美国，更远低于周边的日本、韩国。”

有统计显示，从高校的毛入学率看，我国的大



学生并不多。目前我国高校的毛入学率在 25% 至 28%，根据发展计划，到 2020 年才达到 40%，而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5 年世界教育报告》，1994 年，西方国家的高校毛入学率均已超过了 30%，其中法国、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芬兰、新西兰、挪威 7 个国家超过了 50%。但是这些国家并没有因为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或普及化阶段而带来大规模的大学生失业。

“文凭去泡沫”才是关键

“主要问题不是人数多，而是培养学生的质量”，徐家仪认为，一些大学的专业及课程设置有较大盲目性，专业趋同现象十分严重，造成供给严重大于需求。不少高校仍然沿袭传统的应试教育的教学方式，培养出来的学生高分低能。不少学校专业划分过细，难以跟上市场变化的步伐。

“另一个问题就是就业观念了”，徐家仪介绍说，你跑到海外任何一所大学，问任何一个学生——毕业后想做什么，很少有人会回答“坐办公室”。而在中国的大学，这是很多学生的第一选择。因此，中国的大学生“过剩”，不是绝对“过剩”。

教育专家熊丙奇指出，与其说我国今年有 699 万大学毕业生毕业，不如说今年颁发了 699 万张大学文凭，没有培养质量做保障的大学文凭，只是“文凭泡沫”。

熊丙奇说，眼下的高校毕业生求职高峰期中，一些人文社科类专业学生明显遇冷，这并不是什么“新发现”。这类专业的遇冷，重要原因是学校盲目扩张，我国高校近年来人文社科类专业的扩招规模远大于理工专业，这是因为举办理工专业需要实验设备、专任教师，要付出更大的成本，而举办人文社科专业，扩大招生规模，成本小、更容易。这种功利的办学思维，一方面使学校只注重规模，而忽视办学特色和质量，另一方面导致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严重脱节，由于这些专业招生、培养规模增长迅猛，而社会需求无法跟上，就业难是注定的。熊丙奇认为，我们需要数量更多、培养合格的大学生，但前提是“文凭去泡沫”化。

大学生就业难与经济转型相关

多位高校就业中心负责人均认为，今后几年，关于“大学生就业难”的话题将一直存在，因为，就业观念的问题一时难以解决，大学生就业结构性的矛盾就无法避免。但是，在中国无需过度夸大“大学生就业难”，同样的问题发达国家也有，而中国经济依然高速增长，需求旺盛，中国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依然较低，这些，都为大学生就业提供了保障。可以预见，上海高校今年仍能保持较高就业率。

徐家仪认为，眼下大学生就业难其实是经济转型的产物，并非高校或教育部门一家的责任。从发展看，未来“国退民进”，大企业用人势必减少，中小企业及民营企业将成为吸纳大学毕业生的主体。对此背景，家长、学生能否转变观念？

“现在 90 后毕业生的家长多是 60 后，大多是‘文革’后高校精英教育的一代，理所当然认为自己的子女也应该是精英，而实际上，现在的高等教育已变为大众教育，大学生进入各行各业。60 后家长能接受这种就业观念吗？”徐家仪说，由此可见，中国的大学生就业难，不是市场问题，根源是观念问题。

上海市学生事务中心相关负责人认为，由于经济大环境的原因，今年招聘企业的岗位总需求量与前两年相比下降，直接影响到毕业生就业情况。传统制造业转型，外贸行业整体不景气，中小企业、外资企业的招聘能力降低……种种因素造成今年管理类、外贸类、制造业等相关专业就业难。对此，求职专家明确指出，为什么大学生就只能从事这些工作，他们不能走进车间、走向农村吗？

徐家仪认为，社会转型有个结果，就是服务业需求大量增加。当前，上海服务行业招人难就是一个例证。为此，有的高校及家长学生已经开始转变观念了。河南不少高校开设了“家政专业”，受到市场青睐；上海也有高校将开办“迪士尼服务”专业。有专家向大学生支招：“你愿意从事服务业吗？如果愿意，也许未来的就业之路没那么难。”

(5月13日 新民晚报 张华强 易蓉)



2013 大学毕业生质量排行榜出炉 教师水平成主因

在考生与高校信息长期严重不对称的情况下，如何选择大学，是考生和考生家长每年的难题。继 2013 年中国大学排行榜公布后，5 月 6 日，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中国大学评价》课题组组长武书连在其博客上又公布了 2013 全国 704 所大学本科毕业生质量排行榜，其中也包括浙江的 26 所高校。

9 日，武书连在接受中新网采访时表示，名师才能出高徒，在提高大学毕业生质量方面起决定作用的是教师的学术水平，而对毕业生成长而言，提高学生质量最根本的是要提高基础教育的质量。

毕业生质量名次按地区排名 与大学排名榜大不同

4 月初，武书连在其博客上公布了 2013 年中国大学排行榜，浙大连续三年位居榜首的排行引起了很多人的争议。近日，继 2013 年中国大学排行榜出炉后，武书连又发布了 2013 全国 704 所大学本科毕业生质量排行榜。

不同于往年的是，此次在本科毕业生质量排行榜中，武书连采取了按省份排名的方式，对 31 个省市的 704 所大学进行排名。武书连认为，他在调

查中发现许多考生的意愿指向某些地区或某些省份，为方便考生选择学校，就采取分省排名的方式。

本科毕业生质量排名是将大学的教师平均学术水平与新生录取分数线在全国大学中的名次相加得到毕业生得分，并将得分按序排列得到排行榜，若毕业生得分相同，则按教师绩效名次排列，因此，毕业生得分越小，就意味着该校毕业生质量越好。

全国高校在本科毕业生质量的排名与中国大学的排名在名次上有很大的出入。在中国大学排行榜中三年名列第一的浙江大学，此次在毕业生质量排行榜中以得分 9 分排到了第四，其中复旦大学得分 4 分列第一，清华大学（招生办）得 5 分列第二，北京大学得 7 分列第三。

中国重点大学包括“985”高校和“211”高校，前者只有 38 所，后者则有 112 所。在其榜单中，作为全中国也是全世界第一个推出一个大国所有本科学业毕业生质量的排行榜，本身就是不少非“985”和“211”的高校排名到了重点大学的前面，以北京的大学排名为例，非“211”和“985”的首

都医科大学(招生办)竟排到了“985”高校中国农业大学(招生办)的前面,位列全国第18名,作为“985”高校的中华民族大学则排到了全国第121名。

浙江在本科毕业生质量排行榜中有26所高校上榜,其中有21所进入前350名。相比于去年,今年有10所大学的名次有所上升,武书连对此也表示了肯定,他认为,近几年来,浙江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投入不断增加,教师的学术水平不断提高,而大学毕业生的质量进而也同步提高,但值得注意的是,浙江对高等教育的投入远不如江苏和上海。

在如何提高大学毕业生质量的问题上,武书连认为,在大学阶段,提高毕业生质量方面起决定作用的是教师的学术水平,提高教师学术水平的最有效的途径,是给教师创造一个有充分的学术研究自由的社会环境。

“其实对于毕业生成长而言,提高学生质量最根本的是提高基础教育的质量,基础教育从小学就要培养学生的好奇心、想象力、求知欲望,即使是充满幻想的涂鸦也允许自由发挥。”武书连称,这样对学生的发展更有好处。

“大学教师的学术水平直接影响毕业生质量”

据了解,武书连此前发布的中国大学排行榜的打分依据是人才培养(本科生和研究生)和科学研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

与中国大学排行榜不同的是,本科毕业生质量排行榜采用教师平均学术水平和新生录取分数线两者进行排名。

之所以采用这两种标准进行毕业生质量排名,武书连认为,“站在巨人的肩膀才能超过巨人,因此教师的水平很关键,而同学的平均智商决定了你的周

边环境,在大学各项指标中,只有教师平均学术水平和新生录取分数线这两项指标对学生成才具有决定性意义。”

毕业生质量排行榜出炉后,就读于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一名大四的学生提出了质疑:毕业生质量排行标准为何缺少了对毕业生自身这四年努力的考量呢?同样,考研(微博)人数和考研率以及就业指标,这些作为毕业生质量评估较为客观的指标为何没出现在评价中?

武书连解释说,目前这些数据国家并未解密,因此无法纳入评价体系,若今后数据公开了,他将使用这些数据作为毕业生质量的评价标准。

“名师出高徒。”武书连认为,目前全球有多种研究都证明了,学校教师的平均学术水平与学生毕业质量呈正相关关系。因此,对于毕业生来说,报考教师平均学术水平高、录取分数线高的学校是正确的选择。

一种创新。武书连表示,在创新的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出现各种不同的声音和质疑,不足为怪,各种不同的声音和质疑,都有助于他扩展视野,不断提高毕业生排名的准确性,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服务于人民。

(2013-05-10 中国新闻网 江耘 谢盼盼)



金融改革的 启动路径



编者按:过去十年,中国经济取得强劲增长的同时,金融改革也在推进中。李克强总理说过,改革是中国的最大红利。把握未来改革的趋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期南方周末刊发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金融学教授许小年的观点,供读者参考。

改革思路需要调整一下,应该是基层创新和顶层的总结与推广相结合,而不单纯依靠顶层设计。

金融不能沦为政策工具

好在2000年前后搞了银行改革,否则的话,银行体系无法承受“4万亿”和“4万亿2.0”的重压。

过去我们一直强调政企分家、政金分家,但实际发生的与之相反,政府、金融机构和企业在国内退大趋势下越走越近。以“4万亿”为代表的财政刺激政策大部分都货币化了,真正的财政投入不到2万亿,政府和国企的投资项目主要靠银行贷款,由金融机构出钱。在拉动内需以及产业政策的强力影响下,金融机构的独立性受到侵蚀,独立评估风险和收益的能力,根据风险和收益的平衡选择项目的能力不断降低,为政府的拉动内需和扶持重点产业服务,金融机构再次沦为政策工具。

不仅是信贷、保险、资本市场,货币政策实际上也以稳增长为唯一目标。货币政策目标的官方表述虽然是多重诉求,例如稳增长、调结构等等,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最硬的指标还是GDP增长,而且货币供应作为总量政策,不具备调整结构的作用,结果就是为了保增长而继续发钞。

为了保增长,2009年前后的货币政策说是适度宽松,哪里是适度?分明是极度宽松,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所带来的危害不仅是长时间的通胀压力,现在大家在菜市场、在超市里感觉到的通胀,和公布的

CPI数据有不小的出入。更严峻的挑战是,由于长时间的低利率政策,造成了市场资金成本的扭曲,直接助长了一大批低效甚至无效的项目上马,这为中国经济埋下了很大的隐患。

第一次货币和信贷的极度放松是在2009、2010年,第二次放松就是民间盛传的“4万亿2.0”版。从2012年下半年开始,金融而不是财政,再次充当了主要的资金供应渠道。如果我们回顾一下社会融资总量对GDP的比率,2012年只比高峰期的2009年略低一点,当然,这一次主要是通过资本市场直接融资,而不是银行贷款。

自金融危机以来,金融体系的发展,我个人认为是处于一种倒退状态,结果造成整个金融系统风险的上升。2000年前后我们花了那么大的力量进行银行改革,这个成果在这几年中基本消耗殆尽。现在回过头来想一下都后怕,幸好2000年前后搞了银行改革,否则银行体系无法承受“4万亿”和“4万亿2.0”的重压。

首先要坏把账规模搞清楚

我不认为中国会出现欧洲那样的债务危机。

金融倒退给本届政府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如果要推进新的金融改革的话,首先要处理的便是历史遗留问题,具体而言就是金融体系中的坏账。坏账虽然眼下看不到,但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每一轮投资高峰之后,都会有大量的银行坏账出现,没有一次例外。

上一次的大量坏账是1993、1994年投资高峰中形成的,拖延到了1990年代末,实在拖不过去了,中央领导同志讲:一想起银行坏账,晚上都睡不着觉。所以在2000年前后我们搞了银行改革,清理银行坏

账,充实资本金,国家补一部分,央行拿一部分,国有银行上市,社会融资解决一部分。这次拉动内需的投资狂潮之后,可以想象,必然产生大量的银行坏账,本届政府必须要处理这个问题,拖延,应付是过不了这一关的。

坏账什么时候开始显现?有两个可能的触发因素,一个是经济增长继续放缓,企业经营状况恶化,现金流紧张,还款困难,坏账就冒出来了。实际上2012年的上半年已露端倪,但是2012年下半年的再度宽松把这个问题暂时掩盖了。第二个触发因素是房地产市场的调整,以及和房地产关联度非常高的地方财政。现在我们的政策相互矛盾,竭尽所能地打压房地产市场,但如果打压政策奏效,对金融体系意味着什么?如果房地产市场真的崩盘了,地方财政承担得了吗?

执行“4万亿”政策以来,地方政府到底借了多少债,谁也说不清楚,目前披露的官方数据只有一个,那就是2010年底出自国家审计署的数据,是10万亿。但历史经验证明,这只是一个下限。我本人在下边做调研时,非常关注这个问题,碰到地方政府的财政官员,总要了解他们到借了多少债,到现在为止也找不到准确的数字。粗略的印象,在经济和财政状况较好的东南沿海,地方政府的负债大概是两倍于全年的财政收入。如果按两倍计算,2012年各级政府的财政总收入大约10万亿,10万亿乘以2就是20万亿,那就是国家审计署数字的两倍。最近看到一个半官方数字,是前财政部部长项怀诚在博鳌论坛上给出的:政府负债30万亿。国外有研究机构估计,各级政府负债加总有可能高达GDP的100%,这个估计不是很离谱。2012年GDP50万亿,如果政府负债是项部长所说的30万亿,那就达到GDP的60%—70%了。别忘了,还要包括或有负债,也就是地方政府担保的负债。

很多地方政府的债务用土地抵押,房地产市场一旦垮下来,土地卖不出价了,怎么还债呢?政府还不了的债不就是银行的坏账吗?现在金融机构看到土地抵押和政府担保就放贷,认为是优良资产,有没有想过,谁来担保地价和地方政府呢?所以我说,金融的系统风险在上升。

最近记者问新任的财长,地方政府有没有可能发生债务危机。他说先要调查,了解清楚现在地方政府的债务规模到底有多大。这是很务实的态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金融学教授许小年在演讲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供图)

度,先搞清问题,再想办法解决。政府借了多少钱,违约的风险有多大,为了避免违约,需要多少资源投入。所以新一届中央政府在谈金融改革前,一定要做的事就是清理坏账。也许我把问题看得太严重了,希望没有这么严重,但真不可掉以轻心,先把问题的规模和性质搞搞清楚。

债务不可怕,可怕的是借钱投了没有效益的项目,“4万亿”和“4万亿2.0”的项目有没有效益?看看高铁、城市地铁、机场、光伏、钢铁、有色金属、海运,没有理由感到乐观。

坏账现在从金融机构的报表上还看不出来,因为“发明”了各种各样的做账方法,不是直接改数字,而是找“影子银行”、“影子金融机构”,联手操作。一笔贷款到期,债务人没钱还,监管规定不准展期,眼看要变成坏账,但临近年底,银行有KPI考核,坏账超标拿不到奖金。于是找个中间机构,做个高息的过桥贷款,还了银行的钱,明年开春银行再放款给这客户,还中间机构的钱,坏账就这样被掩盖起来。报表上的数字你敢信吗?我是不敢。

即使政府负债已经达到了很高的地步,起码30万亿,像项部长讲的,或者高达GDP的100%——50万亿,我也不认为中国会出现欧洲那样的债务危机。政府负了很多债,它也有很多资产,不行就变卖资产吧,反正政府也经营不好这些资产。但是这一次变卖资产会比较难,经济下市时的资产价格可比繁荣期,打对折,腰斩很正常,而且这些年国进民退,民间敢不敢买也是个问题,搞不好扣上“侵吞国有资产”的帽子,既有政治风险,也有法律风险。



顶层放开+基层创新

不靠顶层设计,顶层放开就行了,中国的经济改革从来都是先由基层创新开始。

清理坏账之后,第二件事是金融的市场化改革。近年来逐渐扩大债券市场的方向是正确的,提高直接融资的比重。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在扩大直接融资的同时,要强化预算约束,我们现在只提扩大直接融资,不提强化预算约束,一旦市场上出现违约,到头来又是政府兜底,这样的债券市场是没有用的。如果政府兜底,市场的定价机制和惩罚机制就被破坏掉了。你必须要让投资者为他的错误决策付出代价,必须要用破产惩罚债务人,市场的定价机制和约束机制才能够发挥有效作用。要允许债务违约,这个市场就不会起到设想的作用。要严禁政府兜底,特别是为国企兜底,严禁违约时由政府埋单,否则扩大市场也没用。

关于证券市场,我认为应该继续上一届证监会主席所推进的市场化改革方向,减少审批。上届主席上台伊始就放出一句话,IPO能不能不审呢?当然不必审,但后来就无声无息了。要放松对证券市场的管制,监管以信息披露为核心,而不是具体的管理。新主席说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这是令人鼓舞的。

对于PE(私人股权投资)、VC(风险投资)基金,同样也要减少管制。实际上,PE不需要监管,PE是私对私的事,你管得着吗?管的目的说穿了就是为了雁过拔毛,为寻租创造机会。银行也是同样,民营银行你管那么多干什么?他自己掏钱办银行,风险意识比你强多了,你没必要管那么严。

顶层少管,少设计,因为顶层设计往往不靠谱。中国的经济改革从来不是靠顶层设计——顶层只要

放开就行了,而是由基层创新开始的,靠诸如小岗村的农民、创办“傻子瓜子”的年广久、民营企业家。然后,中央把基层的创新合法化,作为政策来推广。自己闷在办公室设计,设计出来的东西拿到市场上一定碰壁,因为政府经济官员不在市场上操作,很多情况预料不到,看上去一个周全的方案,到现实中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我们的经济改革思路要调整一下,从顶层设计逐渐地转向更多地依靠基层创新,基层创新和顶层的总结与推广相结合,而不单纯依靠顶层设计。

能不能把一行三会划归人大?

央行越独立,越能有效控制通胀。

最后谈谈货币政策方面的改革,这就是增加央行的独立性。

世界各国的实证经验表明,央行越独立,货币政策越有效,也就是控制通胀越有效,央行独立性和通胀率高度负相关。政府永远追求GDP高增长,高增长才能搞就业,才能得到选票或者民众支持。央行如果不独立,政府就要让它发钞票,刺激增长,结果当然是高通胀。这不是什么新主张,而是国际上的共识,本届政府应该认真考虑,提高央行的独立性。

我们的央行干脆是内阁的一个组成部分,直接听命于国务院总理,这样的央行无法执行独立货币政策。要提高央行独立性,能不能把央行划归全国人大,央行对全国人大负责?其实不仅仅是央行,金融监管当局也应该是独立的,而不是政府的一部分,把一行三会统统划到人大去。监管机构从属于政府,会带有很多社会目标,成为政府执行政策的工具,而不能把精力集中到市场规则的制定和市场秩序的维护。我前面提到的金融倒退,政府、金融和企业不是逐渐地分离,而是越走越近,和我们的监管体系直接相关。

在金融改革中,重塑微观机制比宏观层面上的调整更重要,厘清政府和企业的关系、政府和金融的关系、金融和社会稳定的关系,做到这几个方面的分离。最近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提到政企分离、政府和金融分离,下一步要研究怎么落实。

(作者:许小年 2013-05-03 南方周末)

本文根据作者2013年4月在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的发言整理)

你怎样 定义“成功”



我和领导者们一起聊天的时候，他们常常会主动讨论起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生活，其中一个不会回避的字眼就是“成功”。当我再问，对于他们而言成功意味着什么时，回答却是多种多样的，包括了各种生活方式、价值观和信念。最普通的回答是“找份好工作赚钱”，更深入的交流可以发现，成功并没有明确的界定，它不仅不能量化，而且都有一种痛苦的领悟。

了解你的成功偏好

年龄较大的受访者倾向于将成功与人生意义联系在一起，他们会问自己：有没有让这个世界比他们来到时变得更好？

我采访了160名管理者，对他们而言这项研究的好处可以用两千年前刻于德尔非阿波罗寺的话语来描述，即“认识自己”。他们中许多人都说，想要自己的生活是与众不同的，但进一步探究就会发现，所谓“与众不同”正是指的成功，但他们都没有对成功的界定做出进一步的明确。所以我要求他们列出哪些感受会让他们产生成就感，大多数的回答都超过了一项。依据提到的次数，成功的指标包括：家庭、财富、事业、名声、权力、迎接挑战、友谊以及人生的意义。

家庭 关于成功，被提到最多的指标是家庭，尽管有些受访者在别人看来是“工作狂”。不管别人如何描述，受访者将成功描述为与家人关系和睦而不是金钱财富、职业生涯等。对于他们而言，快乐并不是源自赚钱。

“作为两个孩子的父亲，成功就是看着他们成长为有责任心的成年人。”一家科技公司的COO说，“我想给予他们我的童年所没有的东西。”这种想法很有共鸣。我采访的管理者中，很多人都是在不健全的家庭中成长的，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有一个不同的成长环境，能够快乐。

家庭的重要性在于价值观与信念，这些决定了他们对待周围人的态度，并有赖于他们自身的经历。当成功被界定为“维护家庭和睦”时，我们可以看到成长于不同家庭的人具有不同的处事方式。“我自己的职业目标有个底线。”这位COO说，“对我而言，无论职位有多高，都要维护与家庭的联系。”

财富 拥有财富是界定成功的第二个指标。对于大多数的受访者，财富很重要，并且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或者正在决定着他们的生活轨迹。这种成功的界定可以理解为追求财富，保持尽量少的债务。一位运动服装品牌的CEO说，“我小时候家里很穷，父母整天为缺钱发愁，我7岁的时候就曾发誓，绝不要那样的生活。”

出身贫寒的人以经济保障作为界定成功的指标并不奇怪，但当他们完成了财富的积累后却感到空虚，正如这位CEO所说：“我现在创造的财富几辈子都花不完，但讽刺的是，我却越发被追求财富的欲望所支配。我不再与父母当年比较，而是开始和有钱人比较，时时想着在财富上超过他们。金钱已经成为我人生的分数，它既是一种幸福，也是一种惩罚。”

事业 相当多的受访者认为,找到一份自己喜欢的职业或事业才是成功。对他们而言,追求满意的职业是最大的满足。一位女性企业家说,她就喜欢每天早晨起来带着微笑去工作的感觉,并且坚守一个信条——做你喜欢的事,幸福就会来。另一位引用伏尔泰的话说,工作可以赶走三大罪恶——无聊、堕落和贫困。

有些受访者认为,努力工作是完成生活中所有目标的唯一途径。一位受访者说,努力工作使你与众不同,无论你从事什么职业,画家、演员、医生或者商人。生活就像骑自行车,停下来是无法保持平衡的。对他们而言,努力奋斗就是在坚守着人生理想。一个杰出的银行家说,那些爬到山顶的人说明他们没有在中途倒下。尽管工作未必带来结果,但不工作肯定没有结果。

名声 把出名视为成功表现的人数不可低估。这些人希望自己的成就被别人接受并欣赏,积极的反馈对他们非常重要。对一些人而言,对出名的渴望缘于不甘心成为一个不为人知的社会成员。鉴于这种自恋的性格,他们想要让自己的存在被其他人觉察到。极端情形下,这种倾向会导致名人做出很多疯狂的事情,因为名气,即使是恶名也会加强他们对自己价值的感知。人们反应越强烈,就会加剧这种行为。这也导致了一种现象,就是出名和取得成就的关系越来越不紧密。从长远来看,逻辑告诉我们通过成就赢得名誉是最好的途径:帕丽斯·希尔顿和她的母亲特丽莎,谁才是理想的榜样呢?

权力 作为一项成功的指标,权力不仅是指静态的拥有,还包括其不断壮大的过程。这组人群纠正以前错误的情绪很强烈,很多人早期处于权力较少的境地,因此将权力视为自由和独立的象征。权力带来的自信让他们感觉良好,并从中建立自我价值和能力。他们迷恋权力,也深知权力的破坏力。他们十分警惕权力的阴暗面,并直言滥用权力的风险。

将权力视为成功重要因素的高管倾向于认为,如果能够有选择地、建设性地使用权力,那将是一

股非常积极的力量。他们认为有必要把权力和责任联系起来。一位高管说,权力可以发挥或好或坏的作用,所以自己面临的挑战是如何明智地使用权力,自己在行使权力时通常伴随很多道德的考量。

迎接挑战 当俄罗斯寡头罗曼·阿布拉莫维奇被问到为什么想购买英国足球俱乐部时,他回答说:“我们的目标是取胜。这不是为了赚钱,我有很多低风险的赚钱方式可供选择。我之所以投资足球是为了成功和奖杯!”

挑战可以让人们找到过去不曾发现的新特点,受访者把它表述为发展自己的需要。一位投资家说,他必须让自己保持最高水准才会感觉良好,远离安逸才能感觉到自己的存在,因此通常在竞争中找到存在感。竞争是人类的一种基本需要,社会和环境也加大了竞争的强度。不得不说,有时候竞争是非常有益的,它可以带来卓越。具有竞争精神的人总是铆足了劲儿去试验、创新并迎接新的挑战。但问题也会随之而生,因为一场胜利总是不够的。一位高级政府官员感慨道:“我喜欢竞争,喜欢赢,这使我陷入了与任何人、任何事的竞争状态而不能自拔。即便赢了也是不够的。这意味着你马上要加入新的比赛,刚爬到一个高点有了一个新起点。”

友谊 一位电讯公司的CEO说:“能结交优秀的朋友说明我生活中的成功。这需要你善待别人,如果你不快乐或者自信,就很难建立真正的友谊。”那些把结交好的朋友并保持深厚友谊的能力视为成功标准的人倾向于认为,没有友谊他们就不能达到最终的人生目标和梦想,某种意义上,友谊是实现最终梦想的手段。当谈到如何保持友谊时,他们认为要付出多于索取,分享朋友成功的喜悦并同情他们承受的苦难。一起做事情能够建立可以共享的新经历,也许是保持友谊长久的重要因素。

(《中欧商业评论》作者:Manfred F. R. Kets De Vries)

曼弗雷德·凯茨·德·弗里斯(Manfred F. R. Kets De Vries)为欧洲工商管理学院(INSEAD)领导力发展教授,全球领导力研究中心主任)

1978年真理标准讨论中 习仲勋先行表态



1980年春，习仲勋（左二）在广州向叶剑英（右二）、胡耀邦（右一）汇报工作。

在一些重大突发事件面前，有的领导干部瞻前顾后，有的则捂盖子、抹泥巴。这些行为的背后往往是因为想的更多的是个人得失而不是群众利益。习仲勋在重大关头胸怀全局、立场坚定，这在“真理标准讨论”过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1978年5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光明日报》刊登后，一石激起千层浪，逐步形成全国性的大讨论。习仲勋在解放思想与“两个凡是”的交锋中，态度鲜明。从6月开始，他领导全省开展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6月30日，他在总结讲话中强调：“离开实践，理论一文不值。马列读得多，但不同实践结合，那有什么用处呢？”在广东省的党政领导人之中，习仲勋是最先公开表示支持和赞成实践标准观点的。在全国，习仲勋也是最早鲜明表达自己观点，大力支持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省级负责人之一。

1979年3月，习仲勋曾经谈到：那一段大家心有余悸，我也心有余悸。人家早给你透过头，那些漏风也是从北京方面来的，你后来又来个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北京有同志见到了我，说我对真理标准问题表态早了，你不表态人家不知道你是啥态度，你表态了大家就知道了这个底。习仲勋的话，说明1978年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复杂性。在解放思想与“两个凡是”交锋胜负未分之时，如果表态不当，将有可能影响到自己的政治命运。尽管当时习仲勋刚复出不久，地位未稳，心有余悸，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他很快就作了表态，不怕再次被打倒，表现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胸怀全局、以人民利益为重的高贵品质。

（本文节选自《习仲勋如何处理广东70年代末大逃港事件》作者：佚名 原载于人民网）